

个人取向与社会取向的自我观：概念分析与实征测量*

陆 洛

(中央大学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所, 台湾桃园 32001)

摘 要:研究者探讨文化对自我观念的影响。经概念分析建立了“个人取向自我观的概念架构”与“社会取向自我观的概念架构”,分别包含了自我观中有关“本体性与结构性”及“功能性与运作性”的内涵。依此两套概念架构,研究者遵循心理计量的程序,编写了两套题库,另纳入其它相关量表,编制成正式问卷,对台湾大学生及社会成人进行大样本施测。以回收的839份有效问卷进行统计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发现:社会取向和个人取向自我观的心理内涵皆为四因素的结构。据此结果选题后,编制成标准化的“社会取向自我观量表”(44题)和“个人取向自我观量表”(41题)。初步分析已确认两份量表之各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俱佳。社会取向自我观的四个分量表与既有的“互依我”测量间的相关较高,而个人取向自我观的四个分量表则与既有的“独立我”测量间的相关较高,初步显示两份新编之自我观量表的区辨及辐合效度亦佳。

关键词:个人取向自我观;社会取向自我观;文化与自我;概念分析;实征测量

一、绪 论

在西方的心理学研究中,“自我”(self)一直是一个相当重要且热门的研究主题,这是因为西方的价值体系一直十分强调个人对环境的掌控及自我潜能的实现,如此强势的自我偏执当然会反映在心理学的“自我”研究中。但是,中国的价值体系并不强调个人去控制环境,表现自我,或实践潜能,而强调人境融合,自我克制及顾全大局,因此,中国人关注的“自我”层面或许与西方人不同,且在这些受到关注之层面上的分化、理解与感受也可能与西方人不同。易言之,“自我”的研究必须回归到文化的脉络之中,从分析东、西方文化对“自我”的不同建构着手,始能发掘对理解中国人的自我有意义,有启示的研究旨趣。

心理学者在解析东、西方文化及其对人类心理与行为的影响时,大多以文化两分的系统(cultural dichotomies)为概念导引,而最常使用的概念系统可谓“个人主义/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是两套不同的文化征候群(cultural syndromes)或社会模式,统整了与某一社会中有关之规范、角色、类别、态度、信念、价值、认同和动机的核心议题^[1-3]。不论是文化还是个人层次的分析,虽然各方理论家所使用的概念名称不同,着重的心理现象和心理历程各异,但都肯定生活在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文化中的成员各有其独特的心理功能模式^[4]。近年来,Markus和Kitayama^[5]所提出的“独立我/互依我建构”(independent/interdependent self construals)在“自我”议题的研究上引起了诸多回响,这一组文化两分的对比概念可视为在个人层次上与文化层次上的“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相对应。最近,杨国枢^[6]重新统整、修正了他之前的“个人取向/社会取向”观点^[7],提出了“华人自我四元论”,意图建立一个华人本土化的自我理论,同时亦突显东、西方文化之“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的差异在自我议

* 本研究由“国科会”资助,计划编号(NSC93-2752-H-030-001-PAE及NSC94-2752-H-008-002-PAE),特此感谢。

【作者简介】陆洛,博士,台湾桃园县中央大学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所教授,中央大学副教务长;研究方向:心理学、组织行为学。

题上的表现。

从后设理论分析 (meta-theoretical analysis) 的角度观之, 不论是“独立我/互依我建构”, 还是“华人自我四元论”, 共同的预设都是: (1) 在不同的文化中, 人们对“自我”的基本看法——“自我观”——是迥异的, 大量的人类学资料可支持此论点^[8,9]; (2) 如此迥异的“自我观”, 源自不同文化所拥有的基本“人性观”的差异^[10,11]。在较晚近的论述中, Markus 和 Kitayama^[12]从对比东、西方文化对“何为人?” (What is a person?) 的看法出发, 提出与两大文化传统对应的两种人性观, 即“独立/互依的人性观” (independent/interdependent views of human nature)^{[12](70)}, 再进一步以“存在之道” (ways of being)^{[12](71)} 的概念引出两种“自我之道” (self ways)^{[12](71)}, 其所指的是: “每个文化与社会团体在每个历史阶段所特有的社会文化参与的模式, 或曰作为一个人存在于世的特定模式”^{[12](71)}。本文所谓的“自我观” (self views) 同样是对“何为人?” 的响应, 即指各个文化或社会团体之成员所特有的对“自我”的看法, 其与此团体所生活的历史、文化、社会脉络息息相关, 主要包含了一整套与自我有关的、统整的想法或信念, 及与自我相关的行为实践。故本文所指的“自我观”较之 Markus 和 Kitayama^[12]对“自我之道”的定义更为具体, 明确指出其范畴应包含与“自我”有关的想法、信念、和行为。本文所指的“自我观”也可视为将杨国枢的^[6,7]“个人取向/社会取向”概念具体落实到“自我”的内涵分析上。简言之, 自我观是文化特有 (culture-specific) 的自我观念 (idea of the self), 即对“自我”的想法、信念、及行为。

在本文中, 我们将对比两种基本的自我观: 个人取向与社会取向的自我观, 前者在西方文化传统中孕育而成, 也在现代的西方社会 (如北美、欧洲社会) 中最为彰显; 后者则在中华文化传统中源远流长, 也依然普遍存在于现代主要的华人社会 (如台湾、中国大陆、香港、新加坡) 中。我们将先分别解析西方与华人文化传统下的自我观内涵, 再阐述在西风东渐与社会现代化的背景之中, 当今台湾华人兼具个人取向与社会取向之“双文化自我” (bicultural self) 的现身, 以作为实证测量的基础。

(一) 西方文化与个人取向的自我观

Bakan^[13]从个体发展的观点认为: 西方人倾向朝着提升人类主宰性的方向发展, 因而强调自我主张与扩展、追求支配与权力、突显差异与独特, 并执着与他人分离, 却压抑了人类本性中共生的一面, 也就忽略了与他人互动、合作、联合与结盟的需要。Geertz^[14]以西方人的观点, 对自我做了一个最为鲜活的描述, 他形容人是“一种有界限的、独特的个体, 多少整合了个人的动机和认知, 是个人意识、情绪、判断和行动之动态中心, 组织成一个有别于他人的整体, 且与其社会和自然背景皆是对立分离的。”^{[14](48)} 这样一个把人看作是有界限的、统合的、稳定的、自主的、以及自由之实体的观点, 正是 Markus 和 Kitayama 所说的“独立我”^[5]。独立我是典型西方信念下自我的特征, 寓居于个体之内, 且相信每个人的属性结构都具有整体性与分离性。

杨国枢^[4]把西方个人主义的自我称为“个人取向自我”, 意即自我主要是由个人所珍视的内在属性所组成的, 其核心是真实的自我 (true self), 包含了人类共有的, 及个人独特的内在生理和心理的能力、潜能及倾向, 这样的自我是一种高度个体化的自我。在杨国枢^[6]最新提出的“华人自我四元论”中, 他认为现代华人已具有了个人取向的自我, 即“强调个人的自主、独立及自足”^{[6](23)}, 这是杨氏对“个人取向自我”之特征的界定, 与“独立我”的特征类似, 所反映的是一种强调独立、自决 (self-determination)、主宰 (mastery) 与独特 (uniqueness) 的自我观。

(二) 中华文化与社会取向的自我观

杜维明^[15]认为儒家传统下的“人”主要被视为“关系中的人” (relational being), 而“他人的出现, 在儒家自我修养的过程中是相当重要的”^{[15](233)}。杨中芳^[16,17]也指出华人自我有着许多深植于儒家文化传统的特征, 如: (1) 华人对自我是非常重要的, 它是理想社会达成的工具, 表现在“克己复礼”的道德实践

上。(2) 华人自我是以实践、克制, 及超越转化的途径, 来使自我与社会结合。(3) 华人自我基本上可视为一个不断向前进步, 走向道德至善的过程。(4) 在自我修养的过程中, 华人自我的界限不断的扩大, 以包含越来越多的他人。从这些都可看出, 华人自我的特征与西方人是大不相同的。

文化心理学的自我建构理论^[5]认为, 华人和日本人都拥有“互依我”。互依我源自对个人与他人之关联性、与互依性的信念, 这是典型东方自我的特征, 个人并非由其独特的特征来界定, 而是由其社会关系来界定。杨国枢^[4]把东亚集体主义的自我称为“社会取向自我”, 意即个人的自我主要由其社会性与关系性的角色、身份、地位、承诺、及责任所组成, 表现为与之相关的想法、感受、意图、倾向和行动。杨国枢^[6]在最新提出的“华人自我四元论”中, 认为华人的社会取向自我根源自华人与环境互动时的高融合、低自主趋势^{[6](18)}。但不论是“社会取向自我”, 还是“互依我”, 所反映的都是一种强调互依共生、角色责任、道德修为、与顺应环境的自我观。

(三) 两套自我系统的并存与现代华人的双文化自我

行文至此, 我们是采用跨文化的对照来突显东西方自我内涵的差异。然而, 在单一文化之内, 实证证据也已显示: 华人社会正呈现越来越多传统性与现代性共存的现象^[18]。陆洛和杨国枢^[19]就有系统地整理了在台湾所进行的华人自我研究的最新成果, 这些研究的主题涵盖了几乎整个自我系统的运作, 包括: 自我概念、自我评价、自我适应以及自我实现, 共同的发现便是: 现今华人确实同时拥有了两套自我系统。

陆洛^[20]在最近一项结合了理论分析、焦点团体讨论与深度个别访谈的研究中, 提出了“折衷自我”(composite self) 的构念, 用以描述当代华人正在发展中的一种全新自我系统的特性。折衷自我巧妙地整合了传统华人的“关系中自我”(即, 互依包容的自我) 与西方独立自足的自我的特色。对当代华人来说, 过去遭到忽略, 甚至压抑的独立自我, 现在却可能在某些生活的场域中(例如: 工作场合) 得以培养、发展、扩充, 甚至受到重视。对生活在台湾的华人来说, 以整合独立自足自我与互依包容自我的态度, 来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间的冲突, 很可能是最好的适应方式。这样的一种折衷自我, 正可同时表达人类基本的个人“独特性(uniqueness)”与人际“关联性(relatedness)”的双重需求^[4], 可以说是一种包含了传统中国文化与现代西方文化基础的双文化自我(bicultural self)^[19]。

现代华人的双文化自我不仅在理论上是可能的, 在实证研究上也已累积了相当丰富的支持性证据^[6,19]。笔者同意 Markus 和 Kitayama^[5]的观点: 自我观“在调节各项心理历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5](225)}, 又如前文所言, 现今华人既已同时拥有了个人取向与社会取向两套自我系统, 则系统、全面地分析个人取向与社会取向“自我观”的概念内涵, 并有效地测量之, 已是当务之急了。此即为本研究的两个具体目的: 一是, 对社会取向和个人取向自我观进行系统性的概念分析, 整理出有关两套自我观内涵的概念架构, 以界定自我观的大致理论范围; 二是, 依据这两套概念架构, 遵循心理计量的程序, 各自编写题库, 经大样本施测后, 以统计分析法选择题目, 编制标准化的社会取向和个人取向自我观量表, 并初步检验其信、效度, 以奠定后续研究的理论与技术(工具)基础。杨国枢和陆洛^[21]也曾按照相同的研究程序来探讨个人取向与社会取向自我实现者的心理特征, 这样的心理计量取向(psychometric approach) 不同于一般“假设—检验”的研究典范, 较适用于探索性的研究, 特别是在概念范围大、实证数据少的情况下, 概念分析及概念架构的提出可保证工具编制时不致有严重的疏漏, 是以周延性为最高原则。

(四) 自我观与其它相关概念之异同

在此宜先说明, 本文所称之个人取向和社会取向“自我观”与文献中既有的“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个人取向”、“社会取向”、“独立我”、“互依我”、“独立自足自我”、“互依包容自我”都有不同之处, 不宜混为一谈。对此, 笔者在另文^[19]中辟了专节详加分析, 在此仅能概略述之, 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酌前文。

概括言之, “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常被视为两套不同的文化征候群或社会模式, 可在社会与个

人两个不同层次上建构与分析，虽有学者批评这样的一组对立概念有过度简化错综复杂的文化现象之虞^[22,23]，但现今的理论分析已相当细致，大多数学者相信“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并非是单一向度的两个极端，且在测量内涵上也绝非对立或相反的^[24]，应无过度简化之虞。“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在概念内涵上几乎囊括了所有与文化相关的重要议题，尤其是个人目标与集体目标何者为重，个人与内团体的关系是疏离还是紧密^[3]，等等，这些无疑都与深层的自我观有关。正如文化心理学者一再强调的，文化与自我是互构的（mutually constitutive）^[25]，分析“自我观”必须关照“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但两者既不同，也不能互换。

杨国枢^[7]最初提出“社会取向”的概念是为了概括描述一种华人特有的社会心理倾向，细分为权威取向、关系取向、团体取向和他人取向四项，是以个人互动对象的特性来区隔的，依序为：具权威地位者、对偶关系中的另一方、团体中的多个成员，及泛指、非特定的他人。杨氏的“社会取向”概念实则是华人的“集体主义”^[4]。不过，杨氏并未对“个人取向”的内涵细加分析。在其最新的“自我四元论”^[6]中，“个人取向自我”被视为一种客体我，对应的“社会取向”则有三种客体我。至此，有两点已很清楚，其一是杨氏建构“个人取向/社会取向”主要是为了与“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对话，亦有以具丰厚中华文化意蕴的“社会取向”取代“集体主义”之企图，故涵括的内容（至少是“社会取向”）相当广泛，绝不止于与自我相关的层面，其实，这组概念并非为解析自我内涵而来。其二，晚近的“华人自我四元论”只是将“个人取向/社会取向”概念用来统整自我的种种表现，诸如自我概念、自尊、自我实现等，从杨氏^[6]在文中呈现的分类架构及所援引的实证研究都可看出：四元论所关注的主要还是客体我，举“自尊”为例，将华人自尊分解成：个人取向的自尊、关系取向的自尊、团体（家庭）取向的自尊及他人取向的自尊四项，所阐述、所测量的是华人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中（主要是社会取向的三种）所表现的自尊内容，并无涉自尊的本质，当然也不涉及自尊的本质所根植的自我观的实质内涵。本文沿用“个人取向”和“社会取向”两词，并以此两取径来解析自我观的实质内涵，望能扩充“华人自我四元论”的理论深度，从对“何为人？”（“自我观”）的思考与分析，再连贯到自我在各种心理历程上的展现（“四元论”的建构）。

Markus 和 Kitayama^[5]的“独立我”、“互依我”建构是围绕着“自我—他人关系”（self-other relation）展开的，独立我强调人我关系的分离，互依我则强调人我关系的融合。人我关系当然是自我内涵中重要的面向，“人”、“我”的界定也与自我观息息相关，但毕竟还不是自我观的全部。例如，“互依我”并不涵括自我的道德修为，也不包含自我可以是多面向并存，且是一个不断改变与转化的历程之信念，而这些都是华人自我观之重要内涵。此处或许可说：本文所分析的自我观理应涵纳“独立我/互依我”的自我建构，但范围又更广阔，两者应有关联但不等同。相似的，陆洛^[20]在提出折衷自我时也是以人我界定为焦点，其“独立自主自我”和“互依包容自我”作为折衷自我的两大元素，可视为是“独立我”、“互依我”建构的扩充与文化扎根，奠基于中华文化遗产与台湾华人当今生活的现场，其与自我观的关系一样是既关联又不等同的。

最后可一并提出的是自我观与自我研究中关注最多的“自我概念”（self-concept）的区别。所谓自我概念，是指个人对自身的基本本性（basic nature）、独特特性（unique qualities），及典型行为（typical behavior）的信念之集合^[26]，意即自我概念是个人对自己的系统性的了解与知识（self-knowledge）。自我概念的研究着力在解析自我知识的组织系统或架构，与文化相关的最新自我模式如 Sedikedes 和 Brewer^[27]的“三元模式”，包含了个人自我（individual self）、关系自我（relational self）和集体自我（collective self），其实响应的是“我是谁？”（“who I am”）的心理学问题。此等自我知识（或称自我了解）和自我概念较贴近“客体我”，可用“二十句陈述句测验”（Twenty Statement Test, TST）的技术，经由完成“我……”或“我是……”（“I am …”）的句子来测得。前述杨氏的“华人自我四元论”亦是类似的理论建构，传统的自我概念量表

(如“田纳西自我概念量表”)所测得的亦是这一层次的内涵,所不同的只是分类和组织架构而已。简言之,自我概念所关注的是人们对自身作为一个独特之人的了解,通常是较为表层的有关自我的知识。如:“我是个快乐家庭的一员”(“I am a member of a happy family”),这是“田纳西自我概念量表”中测量“家庭自我”(family self)的一题。可看出这样的自我概念界定与测量并不指涉个人对“自我”这一哲学实在的信念或看法,而是非常具体的个人对自身家庭状态的描述。相反的,本文所述的“自我观”关注的是更为深层的哲学诘问:“人何以为人?”及“自我的本质为何?”此处的“人”与“自我”都非指特定之人,也非指被思考主体所感知之客体,而意指某一特定文化传统之中根深蒂固且致力实践之对人的本性及自我的本质的观念,较接近 Markus 和 Kitayama^[12]所谓的“自我之道”。这样的自我观超越了任何一个个体的琐碎细致的自我知识,而是环绕着文化最核心的价值与理想组织而成,所指涉的正是“作为一个人”的最抽象但也最为统整的建构。概言之,任何有关自我的建构一定都涵纳了自我概念(具体的自我知识),但自我观具有更广泛、更高层次的意涵。至此,我们应可说,“自我观”的提出奠基于既有的文化分析(比较)和自我建构,但又不同于这些理论和观念,而更具有增益价值(incremental value)。当然这样的增益价值不能只从理论分析和概念比较的层次上宣称,还有赖后续系统性的实证研究(如概念效度的检验)来支持。

(五)“社会取向和个人取向自我观概念架构”之提出

从文献探讨中已可看出:与个人取向自我观有关的观念主要有个人主义、个人取向、独立我及独立自主的自我等,与社会取向自我观有关的观念主要有集体主义、社会取向、互依我、及互依包容的自我等。本研究对个人取向自我观的概念分析是以 Triandis 等人^[3,28]所列举的个人主义特征及他们以因素分析所得的个人主义因素的内涵^[29,30], Oyserman, Coon 和 Kimmelmeier^[24]最近对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文献进行全面性检讨后所发现的学者对个人主义在理论与测量上的共识,还有杨国枢^[6]所分析的个人取向自我的特征, Markus 和 Kitayama^[5]所提出的“独立我”的内涵,以及陆洛^[20]所提出的“独立自主自我”的大致范围与她以实证资料所界定的各项范畴,作为主要参考依据,再辅以其它相关的理论与文献,综合整理成一套个人取向自我观主要内涵的概念架构。

本研究对社会取向自我观的概念分析则以 Triandis 等人^[3,28]所列举的集体主义特征,及他们以因素分析所得的集体主义因素的内涵^[29,30], Oyserman, Coon 和 Kimmelmeier^[24]所发现的学者对集体主义在理论与测量上的共识,还有杨国枢^[6]所分析的社会取向自我的特征, Markus 和 Kitayama^[5]所提出的“互依我”的内涵,以及陆洛^[20]所提出的“互依包容自我”的大致范围与她以实证资料所界定的各项范畴,作为主要参考依据,再辅以其它相关的理论与文献,综合整理成一套社会取向自我观主要内涵的概念架构。

在此宜先说明:“个人取向自我观”和“社会取向自我观”实则是两套各有文化根源又富含文化意蕴的自我观念系统,在理论分析的层次上,它们如同“文化原型”的概念,是“应然”层次的思考,用以引导实证研究,但并不应预期其会在实证研究中原封不动地再现或复制。因为人的生活现实远非理想状态,个人对文化价值的认同及在文化体系中的参与本来就富含主观能动性,此即文化与自我互构的动态历程。以本研究所选择的量化心理计量典范并不能捕捉这么丰富的动态样貌,但还是能发现每套自我观念系统在人的心理体验中所存在的基本结构。藉此,本研究希望能将概念分析与实证衡鉴密切结合,做出跨越理论分析与实证探讨的努力。

从先前的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我们已可看出:个人取向和社会取向两套自我观都是由多元特质所构成的,如同“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的观念,个人取向和社会取向的自我观不必然是单一向度之两极端,但也不必讳言:不同的文化传统对关乎人性的某个基本议题采取对立的立场是完全可能的,正如“独立我”和“互依我”在人我关系议题上的两极。笔者认为:在建构理论和推展实证研究的初期阶段,采用文化对比的角度有助于突显文化差异的议题,诚如之前许多学者的做法^[4-6]。故此,下文的观念架构采用并列“对

显”的方式呈现，目的不在宣称两种自我观的逐项对立，而在突显其背后文化传统的整体差异。易言之，笔者认为这两套自我观是彼此独立的，对显只是一个工具性的决定，用来彰显（极大化）文化的差异。

这两套自我观架构各包含两大项，分别指涉自我观中有关“本体性与结构性”的内涵，及有关“功能性与运作性”的内涵。前者是指自我作为一哲学本体的实在及自我在构成成份上的特性，响应的是哲学层次上的“自我是什么？”的问题，这部分主要依据的是中西哲学家们有关“自我”的论述，具较高层次的意涵；后者是指自我作为一心理系统的运作及自我在日常生活中的所扮演的主要功能，又具体表现为处理“与他人的关系”、“与团体的关系”及“与社会（含环境）的关系”。其中“与他人的关系”约略可对应“互依我”及“关系取向自我”的特征，“与团体的关系”约略可对应“家庭（团体）取向自我”的特征，而“与社会（含环境）的关系”部分可对应于“他人取向自我”的特征。诚如前文述及，这两套自我观系统的提出受惠于诸多学者的理论与概念分析（详见所列的参考文献），论文篇幅不容笔者逐一详述，只能概略陈述后，再择一两个重点补充说明。这两套架构各有 24 细项，现呈现如下：

社会取向与个人取向自我观的概念架构

1. 本体性与结构性

社会取向自我观	个人取向自我观
1.1 自我是一可变的，具弹性的实体。	自我是一恒定的，具体的实体。
1.2 自我会有矛盾性与多面性，看人要看全部。	自我是以“真我”为核心，且力求内部（自我）的一致性。
1.3 强调道德与灵性自我。	不特别强调道德与灵性自我。
1.4 自我是镶嵌在社会关系之中的，强调人际互依。	自我是与社会脉络分离而独立存在的，强调独立。
1.5 强调关系与集体的自我。	强调个人的自我。
1.6 强调人与人的相似性，重视平凡。	强调个人的独特性，重视与众不同。
1.7 接受公开与私密的自我是不同的，甚而鼓励此等不同。	重视公开与私密的自我要保持一致。
1.8 自我与他人的界限是弹性的。	自我与他人的界限是固定的。
1.9 追求自我扩展以包纳他人，最终目标是天人合一。	以追求自我超越为人性之极致表现。

2. 功能性与运作性

2.1 自我与他人的关系（Self-other relation）

社会取向自我观	个人取向自我观
2.1.1 社会关系的本质是共生性的。	社会关系的本质是交换性的。
2.1.2 强调人际共享。	强调人际竞争。
2.1.3 强调人际情感。	强调理性。
2.1.4 要求表现合宜的行为及各种面子功夫。	接受且重视个人偏好的表达。
2.1.5 对他人的反应与评价很敏感，且依据此类社会讯息来形成自我知识（了解）。	依靠自我探索来形成自我知识（了解）。

2.2 自我与团体的关系（Self-group relation）

社会取向自我观		个人取向自我观	
2.2.1	强调归属并融入社会团体。	强调依靠自己，加入团体是个人的选择。	
2.2.2	强调内团体的整合。	强调与内团体保持心理距离。	
2.2.3	优先追求团体目标。	优先追求个人目标。	
2.2.4	强调团体福祉，不惜牺牲个人利益。	强调个人福祉，追求享乐。	
2.3 自我与社会的关系 (Self-society relation, including self-environment relation)			
社会取向自我观		个人取向自我观	
2.3.1	个人与社会关系之本质为融合的。	个人与社会关系之本质是敌对的。	
2.3.2	谨守社会规则与规范。	个人的情感与态度是行为的导引。	
2.3.3	强调对情境的敏感。	强调自我的一致性。	
2.3.4	要求个人扮演好社会角色，完成角色责任。	重视个人内在特质与潜能的实现。	
2.3.5	强调顺应环境。	强调主宰环境。	
2.3.6	靠自我批评及承诺自我改善，来避免社会惩罚，获取社会肯定。	靠自我强化及自我成长，来获取自尊及社会尊重。	

在中国传统哲学的理念中，自我是具有弹性的、可变的，是一种精神发展的动态历程，同时也强调个人的道德修为，视之为自我完善的重要手段。这样的自我在外显行为上可能会有多面性，甚至有矛盾，这可能正是自我响应各种情境要求的弹性处理，故看人与析事一样，要有整体观。社会取向的自我本质上是“人伦”的，是镶嵌在社会关系网之中的，正因这种互依性、关系性与集体性的自我格外重要，自我的独特性常被压抑，相似性才是强调的重点，以维持团体及社会的和谐运作。这种自我的两面性也可能比较高，公开的自我与私密的自我之间会有较大的差距。对社会取向的自我而言，自我与他人的界限并非固定的，而是有弹性的，甚至将不断追求自我的扩张以包纳他人作为道德修为的课目，正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自我的完善而言，天人合一才是终极目标。

相对应的，在西方个人主义的价值系统中，自我是一个恒定不变的实体，是以“真我”为核心，以一致性 (consistency) 和统合性 (integration) 为最高原则。个人取向的自我强调人与社会的分离，甚至对立，强调个人性的自我内涵，突显个人的独特及与众不同，也重视公开与私密的自我应保持一致 (除了礼貌等规范性因素的考虑之外)，对个人取向的自我而言，自我与他人的界限是相当明确且固着的，而自我的终极目标则是个人潜能的充分发挥与自我超越。

以上是两套自我观在**本体性**和**结构性**上的特色，现再就其在**功能性**与**运作性**上的特色概述之。在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方面，社会取向的观点认为社会关系的本质就是共生性，人绝不能离开他人而生活，故特别强调人际共享和人际情感，使之成为角色义务的心理基础。同时，社会规范也要求个人表现合礼合宜的行为，运用各种面子功夫来维持人际和谐，个人也会对他人的评价与响应特别敏感，并据此作为自我了解的基础。相对应的，个人取向的观点则认为社会关系的本质应是交换性的，以个人福祉为中心，透过人际竞争来达成自我的目标，强调理性功能的发挥，以诚实地表达个人的偏好、感受和需求，作为人际关系的基础，主要靠自我探索来达成自我了解，对他人评价的在意度较低。

在**自我与团体的关系**方面，社会取向的自我强调个人应依附并融入团体，在团体内克尽本分地扮演好自己的角色，维护团体的和谐与完整，并以团体目标与福祉为优先，甚至不惜牺牲个人利益。相对应的，个人取向的自我则强调个人要靠自己，自给自足，即便加入团体，也应是个人基于自身利益的自主性选择。

个人在团体内依旧要保持自主性，维持与团体适当的心理距离，处于独立而非融合的位置，个人目标优先于团体目标，个人福祉才是最重要的考虑。

在**自我与社会的关系**方面，社会取向的自我强调个人与社会的高融合性，重视社会规则与规范，以解读情境要求，并配合表现出合宜的行为来顺应环境，完成被赋予的角色责任，并藉由自我批评、自我改善等道德修为的努力，来赢得社会肯定。相对应的，个人取向的观点则视个人与社会为对立的关系，追求自我在跨时间、跨情境中的一致性，视个人的内在情感及态度为行为的导引，而非依循社会的规范与要求。个人取向的自我亦极为重视个人潜能的充分发挥，强调自我对环境的掌控与主宰，靠着自我提升和自我成长来获取自尊和社会尊严。

接着，我们以这两套自我观概念架构中相当重要的 1.2 和 1.3 项为例，再行详加说明。先谈第 1.2 小项，个人取向自我观十分强调“真我”为自我的核心，如 Rogers^[31]在其名著《成为一个人（“On Becoming A Person”）》中就特别强调人要相信自己，诚实面对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活出真正的自己（the true self）。事实上，西方心理学家在将人格理论和自我论述应用于临床治疗和谘商辅导时，都将找到真我（自我了解）活出真我（自我接纳）视为心理健康的终极指标^[32]。与此同时，这样的“真我”是有其内在统整性和一致性的（coherent and consistent），这也是西方心理学者在论述自我时相当有共识的看法^[33]。社会取向自我观则相信自我是多面向的，各面向之间甚至可能有表面上的矛盾与冲突，这是可以也必须容忍的。已有相当多的实证研究显示：华人的思考带有素朴辩证论的色彩，较能容忍矛盾性和不一致性，关注整体而非局部分析^[34]。在自我呈现上，集体主义文化下的亚洲人也不追求跨越情境的一致性和稳定性，却强调视情境要求而弹性调整自我的表现内容与方式^[33]，相当接近许烺光所言之“情境取向”的概念^[10]。

再以 1.3 项为例，社会取向自我观强调道德修为和灵性成长，杨中芳^[16,17]在分析儒家传统下自我的特色时就指出：华人的自我发展可视为一个不断向前进步，走向道德至善的过程。陆洛和杨国枢^[35]在分析儒家对理想人格的论述时也指出：自我完善的重点就在于个人人格的德行修持与道德实践，从修身的内省功夫开始，由“修己以敬”到“修己以安人”，再到“修己以安百姓”，将道德实践的范围从自己开始，在人际关系网中层层外推，也使道德实践的成就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渐次提升，最终成就“内圣外王”的完美自我典范。儒家对道德修为的坚持可谓不遗余力，而中华文化传统中的另两大流派，道家和佛家则将不同意涵的灵性修为带进了自我的本质，何友晖^[36]对此有详尽的解析，此处不再赘述。西方文化虽是以基督教传统为根基，但经过宗教世俗化的现代化洗礼，灵性成长大多被归于宗教性的范畴，在自我的界定中并不占主导性的地位，而表现为一种最高层次的超越性心理需求^[37]。东西方的道德观也有本质的不同^[38]。对照儒家将道德置于自我之中心的论述，个人取向自我观对个人的道德修为并不特别强调。当然，如果我们讨论的是一个有虔诚基督教信仰者的自我观念，恐怕就另当别论了。

最后，我们必须对两套自我观的关系略述一二。华人究竟有几套自我？陆洛和杨国枢^[19]经由理论分析和大量实证资料的综述，得出的结论是：现代台湾华人拥有传统与现代的“双文化自我”。所谓传统的自我正是社会取向的自我观及其种种展现，而现代的自我则是个人取向的自我观及其展现。这也呼应了陆洛^[20]在华人折衷自我中所揭示的两大元素：互依包容的自我与独立自足的自我。值得一提的是，这两套可视为文化原型的自我系统在现代华人社会中正经由并存不悖、共生共荣、到融合统整，在人的主观能动创造和转化下，最终可能成为一套全新的心理资源，来促进心理适应及心理福祉^[6,20]，这正是文化融合的一种可能性。但在这个漫长的历程中，个别差异和多样多元的发展都是常态，对此杨国枢^[39]有过周详的分析，在此不加赘述。唯宜指出，若要进一步讨论不同自我系统间的关系，或分或合，或变或不变，都必须先解析出每套文化原型系统的结构与内涵，并予以客观有效的衡鉴，此正乃本研究之目的也。

二、研究方法

(一) 研究样本

本研究的对象为台湾大学生与社会成人。大学生样本来自全台北、中、南共 15 所公私立大学各科系的大学生与研究生,社会成人则是在北部、中部及南部各一所大学中进修的在职人士。研究者共计发出 992 份问卷,回收 874 份,回收率为 88.10%,扣除其中遗漏项过多及有明显答题倾向者后,正式纳入后续分析的有效问卷共计 760 份,有效率达 86.96%。有效样本中学生共 654 人,社会成人共 90 人,未表明身份者 16 人。样本详细的个人背景数据请见表 1。

表 1 样本个人背景数据 (N=760)

变项		人数	有效%
性别	男	484	63.7
	女	268	35.3
	未填答	8	1.1
教育程度	专科以下	35	4.6
	大学	513	67.5
	研究所	204	26.8
	未填答	8	1.1
职业	学生	434	57.1
	有全/兼职工作	316	41.6
	未填答	10	1.3
婚姻状况	未婚	621	81.7
	已婚	121	15.9
	其它	1	.1
	未填答	17	2.2
年龄	平均数	27.6	标准差
	范围	18~57	7.02

(二) 研究程序

本研究程序包含了概念分析、专家效度检核、题库撰写、题本修订、正式施测、统计分析、正式量表的编定、信度及效度检验等多项,现逐一详述如下:

1. 两类自我观的概念分析

请见前节“‘社会取向和个人取向自我观概念架构’之提出”项下的说明。

2. 专家效度检验

邀请四位熟谙东、西方自我理论与研究的资深学者审定前述两套自我观的概念架构,专家们皆表示原则上的肯定。其中一位具体建议将“功能性与运作性”大项下的“自我与他人关系”小项再细分成“自我

与他人关系”及“自我与团体关系”两项，使两者的界定更为明确。笔者据此对架构作了修正。专家效度检验是遵循心理计量研究程序时必须做的基本步骤^[21]，真正严谨的效度检核必须有赖于如构念效度研究等方法进行，此项工作现已大致完成，且成果良好^[40]，唯研究范围甚大，宜另行撰文报导。

3. 撰写量表题库初稿

根据概念架构，参考现有的各项测量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及自我建构的标准化量表，重新撰写个人取向与社会取向自我观的题库。题目的撰写除遵循心理计量的一般要求（如不得有双重意涵）外，亦考虑“自我观”这一概念的特性。共完成个人取向自我观 120 题，社会取向自我观 130 题。

4. 召开题库讨论会

召开座谈会，逐题讨论两套题库初稿中各个题目与其所欲测量之概念间的妥贴性与适当性，一并考虑题目间的重复性与周延性，亦修订题目的修辞与表达。参加讨论会者除笔者外，尚有一名人格与社会心理学的博士候选人、一名社会心理学硕士及社会心理学硕士班研究生四名。经讨论后，个人取向题库增拟 5 题，定稿为 125 题。社会取向题库删除 6 题，定稿为 124 题。

5. 编制正式施测之题册

编制结构性问卷，共包含以下各项：(1)“个人取向与社会取向自我观量表”（分别为 125 与 124 题，新编）；(2)“独立我与互依我量表”^[41]，此为依据 Markus 和 Kitayama^[5]所提之“独立我”与“互依我”的内涵及 Triandis^[3]所分析之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典型特征，所编制的标准化量表，主要涵盖东、西方两种自我在处理人我关系及群己关系时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特征，可作为(1)的关联效度检定工具，研究者预期独立我与个人取向自我观会有高相关，互依我与社会取向自我观会有高相关；(3)“自我建构量表”，此为 Gudykunst 等人^[42]所编之工具，测量 Markus 和 Kitayama^[5]所提之“独立我”与“互依我”的内涵，在西方研究文献中广为使用，在本研究中亦作为(1)的关联效度检定工具，假设亦如(2)；(4)“华人社会期望量表”^[43]，选取 7 个正向题，作为控制社会期望偏误的测量工具；(5)自编“个人基本资料”问卷。全套问卷共 286 题，附上说明与指导语后，可由研究参与者自行填答完成。

前项(1)和(3)采 Likert 六点量尺评量(1=非常不同意,6=非常同意)，(2)采 Likert 七点量尺(1=非常不同意,7=非常同意)，(4)采 Likert 五点量尺(1=全不符合,5=完全符合)。由于(2)、(3)、(4)皆为已发表之标准化工具，故采用原作者的设计进行施测与计分。

6. 正式施测之进行

大学生与社会成人的资料均采用团体施测收集，因问卷题目甚多，为提高受试者填答意愿，确保研究质量，我们在发放问卷时均致赠一份精美礼物。

7. 进行题目分析与因素分析

施测完毕后，分就个人取向与社会取向自我观量表进行题目分析。先行删除不具鉴别力、分布太过偏颇及受社会期望影响过高的题目，再以探索性因素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分别鉴定出个人取向与社会取向自我观的主要心理成分。

8. 编制正式量表

依据题目分析与因素分析的结果，为每一份量表选择足够之适当题目，编成两套正式标准化的量表。

9. 初步信、效度之检验

分就新编之“个人取向自我观量表”与“社会取向自我观量表”，以 Cronbach α 及再测信度法检验两套量表之各分量表的信度；并以相关分析法检视其各分量表分数间的关系及其与关联效标量表间的关系。

三、研究结果

(一) 自我观因素的鉴定

我们在施测了两套自我观量表后,以所搜集的实证资料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俾获得社会取向自我观与个人取向观的心理内涵因素结构。在进行因素分析前,我们先以下列三项标准删除了不具鉴别力或受社会期望影响过高的题目:(1)平均数大于5或小于3者;(2)峰度或偏态过高者(绝对值大于1);及(3)与社会期望量表的总分相关大于.40者。依此,在后续所进行的所有数据分析中,“个人取向自我观量表”共删除11题(余114题),“社会取向自我观量表”共删除15题(余109题)。再者,我们也删除了社会期望量表总分高于30分的受试者,以排除受社会期望影响过高者,共计删除了79人(余760人)。此即为因素分析所使用的题本与样本。

探索性因素分析是以主成分法(principal-component method)抽取多个不同因素,以Kaiser之常态化promax法转轴。结果显示:两种自我观应都是多向度的复杂建构,皆可抽得3至6个具有高度心理意义的斜交因素(oblique factor)。在选择因素结构模式时,同时考虑多重指标,包括:陡坡图、特征值(eigen value)因素结晶程度是否良好,因素所含题目之理论意涵是否清晰一致等。在比较了多套因素结构模式后,笔者认为个人取向自我观的内涵应以四因素模式为最佳,这四个因素依次可命名为:(1)“独立”(independence),可解释19.38%的总变异量;(2)“自主”(self-determination),可解释10.49%的总变异量;(3)“竞争”(competition),可解释6.80%的总变异量;及(4)“一致”(consistency),可解释4.84%的总变异量。四个因素合而可以解释总变异量的41.16%。这四个因素之特征值都在2.24以上。四因素的命名完全根据每个因素上之因素负荷量最高的题目所表述之主要概念内容为之。个人取向自我观的四个因素之因素负荷量最高的题目,以及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分见表2至表5。四个因素间的相关皆达显著正相关($p < .001$,双尾检定),相关系数绝对值的范围介于.16到.50之间。由此可以推断:个人取向自我观的四个因素间确有相关,但也仍保有相当程度的独立性。

表2 “独立”——个人取向自我观之因素一

	题目	因素负荷量
1.	不管个人天赋如何,每个人都应该最大程度地发挥自己的能力。	.799
2.	不管环境多么险恶,也绝不能放弃努力。	.726
3.	人不应消极地适应环境,而应积极为自己创造好的条件。	.711
4.	人生最大的快乐莫过于实现自己的志趣。	.686
5.	不管实际的表现如何,对自己的信心不能动摇。	.669
6.	我相信人不应是环境的奴隶,要做自己的主人。	.663
7.	不管外界的压力多大,人要保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行动能力。	.663
8.	生命的价值就在于充分实现自己的潜能。	.654
9.	自我激励是成功的不二法门。	.637
10.	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事情,要有自己的判断。	.608
11.	我觉得人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在社会上随波逐流。	.554
12.	我认为即使是一家人,仍应该保有各自的独立性。	.547
13.	成功的人从不逆来顺受,而是努力克服环境的限制。	.523
14.	我相信人要努力改造环境,不能向环境低头。	.522

Cronbach $\alpha = .895$

表3 “自主”——个人取向自我观之因素二

	题目	因素负荷量
1.	我对自己已有定见，不会在意别人的评价。	.759
2.	别人不会影响我的自我认同。	.742
3.	别人是否喜欢我，并不会影响我对自己的看法。	.726
4.	我对自己的看法，不会受到别人的影响。	.687
5.	忠于自我最重要，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	.635
6.	我就是我，不会为了迁就别人的观感而言不由衷。	.623
7.	我人生的重要决策都是自己作主，不会受别人左右。	.572
8.	不管别人怎么想，我对自己的看法不会改变。	.544
9.	我敢于做别人没做过的事。	.507
10.	我能果断且有自信地做决定，因为我对自己有充分的了解。	.488
Cronbach α =.868		

表4 “竞争”——个人取向自我观之因素三

	题目	因素负荷量
1.	只有在竞争中胜出，才会得到大家的尊敬。	.725
2.	胜者为王，这是永远不变的铁律。	.630
3.	对自己有利的人际关系才值得投资心力去经营。	.560
4.	在各方面表现得比别人好，对我而言很重要。	.558
5.	个人的成功远比团体的表现来得重要。	.555
6.	我觉得一个人最终的价值在于他成就了什么。	.530
7.	不管怎样，我的表现永远优于那些比我差的人。	.519
8.	我建立的人际关系都是对我有利的。	.491
9.	世上没有永远的朋友，每个人都有可能是你的竞争对手。	.490
10.	我自己的幸福是第一位的，有余力我才会考虑别人。	.472
Cronbach α =.777		

表5 “一致”——个人取向自我观之因素四

	题目	因素负荷量
1.	我在公开场合与私下场合的表现都一样。	.800
2.	我是个很一致的人，在家里和外面都一样。	.755
3.	在日常生活中，我不会言行不一。	.676
4.	我的言行举止不会前后矛盾。	.659
5.	不管和谁在一起，我的表现都一样。	.629
6.	在任何场合，人都应该诚实地说出自己的想法。	.578
7.	我觉得做人应该表里一致，心口如一。	.506
Cronbach α =.827		

对社会取向自我观的内涵所进行的因素分析，程序完全同上。在比较了多套因素结构模式后，笔者亦认为社会取向自我观的内涵以抽取四因素为最佳，这四个因素依次可命名为：(1)“情境自我”(contextual self)，可解释 20.08%的总变异量；(2)“人际连结”(interpersonal relatedness)，可解释 7.13%的总变异量；(3)“自我修养”(self-cultivation)，可解释 4.29%的总变异量；及(4)“社会敏感”(social sensitivity)，可解释 3.52%的总变异量。四个因素合而可以解释总变异量的 35.02%。这四个因素之特征值(eigen value)都在 1.97 以上。四因素的命名完全根据每个因素上之因素负荷量最高的题目所表述之主要概念内容为之。社会取向自我观的四个因素之因素负荷量最高的题目，以及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分见表 6 至表 9。四个因素间的相关皆达显著正相关($p < .001$ ，双尾检定)，相关系数绝对值的范围介于.28 到.50 之间。由此可以推断：社会取向自我观的四个因素间确有相关，但也仍保有相当程度的独立性。

表 6 “情境自我”——社会取向自我观之因素一

题目	因素负荷量
1. 我可以理解人在不同的情境中，可能会表现出矛盾的行为。	.751
2. 我认为人有许多面，不同的面向之间可能是有冲突的。	.715
3. 凡事都在变，我们也一样会变。	.690
4. 我觉得人是会变的，同一个人不同场合的表现可能完全不同。	.680
5. 依环境的不同要求，做出最合适的反应，才是一个有弹性的人。	.675
6. 每个环境都不同，我们的行为应该有相应的调整。	.656
7. 我们待人处世的方式应该有亲疏远近之分。	.564
8. 我认为人应该视自己的身份与角色，表现出适当的行为。	.542
9. 一个心理成熟的人可以随时调整自己的行为，而不会觉得自相矛盾。	.485
10. 我每到一个新环境，都会仔细观察，再决定适当的做法。	.410
11. 一旦加入了团体，我们就要努力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	.381

Cronbach α = .844

表 7 “人际连结”——社会取向自我观之因素二

题目	因素负荷量
1. 家庭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无论如何我都会把家人放在第一位。	.825
2. 我觉得享受人生应该以家人的幸福为前提。	.788
3. 我们与家人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甚至到了休戚与共的程度。	.746
4. 个人应牺牲自己，以维护家庭的整体利益。	.745
5. 我与亲密家人的关系，可以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来形容。	.715
6. 我们要努力克制自己的欲望，并将家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693
7. 拥有美满的家庭生活，才算真正实现了个人的自我价值。	.627
8. 我们努力奋斗，就是为了让家人过幸福的生活。	.614
9. 我总是将亲密的人看作是自己的一部份。	.504
10. 我的幸福来自于周遭亲近的人的幸福。	.464
11. 亲密的人的幸福远比我个人的幸福来得重要。	.384
12. 我的喜怒哀乐都可以与亲近的人分享。	.366

Cronbach α = .858

表 8 “自我修养”——社会取向自我观之因素三

	题目	因素负荷量
1.	我觉得照顾好自己身边的人还不够，还应不断努力造福更多的人。	.623
2.	我们应该专注精神层次上的提升，而非贪图感官上的享受。	.611
3.	我很敬佩那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	.596
4.	从爱父母兄弟开始，人要努力做到兼爱天下。	.582
5.	我很崇敬那些「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人。	.580
6.	我相信道德修为是非常重要的，不应稍有懈怠。	.574
7.	自我发展最高的境界应该是「天人合一」了。	.565
8.	我们要一日三省，才能不断进步。	.550
9.	我们做人做事应采中庸之道，不要过于偏激。	.438
10.	琴棋书画能帮助我们陶冶性情，在精神上获得充实。	.421
11.	我认为平凡是一种美德，不必过分追求自我表现。	.367
12.	我觉得随遇而安、乐天知命，是最高的人生智慧。	.361
Cronbach α =.810		

表 9 “社会敏感”——社会取向自我观之因素四

	题目	因素负荷量
1.	我会隐藏个人的想法和喜好，以免破坏人际和谐。	.623
2.	我对自己的评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别人对我的看法。	.515
3.	我们要随时注意别人对自己的观感，并做出相应的调整。	.515
4.	我觉得有些人在任何场合都表现同样的行为，是很不明智的。	.512
5.	我觉得特立独行通常不会讨人喜欢。	.487
6.	我觉得竞争常会伤害朋友间的感情。	.486
7.	人是生活在社会中的，所以别人对我们的评价至关重要。	.482
8.	我们做人要懂得妥协退让，强出头通常不会有好结果。	.435
9.	为免别人的负面评价，谨言慎行是绝对必要的。	.362
Cronbach α =.703		

以心理计量典范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的最主要目的是找寻数据中所呈现的基本心理向度，此时判断一个多因素模式是否“最适”的标准很多，但各因素内涵的心理意义是否明确，因素内部聚敛是否良好，因素间区辨是否合理等是较为重要的考虑^[21]，从表 2 至表 9 中的数据可见，这两套四因素的结构大致符合上述的检验标准。

在此附带一提，笔者已完成另一系列的构念效度共五项研究^[40]，全部样本为大学生 884 人，以内部一

致性检验信度，发现“个人取向自我观量表”四因素的 α 值介于.77~.89 之间，“社会取向自我观量表”四因素的 α 值介于.75~.89 之间。再以相隔两个月的前、后测相关系数检验各分量表的再测信度，发现：个人取向四因素的再测信度（相关系数）介于.60~.82 之间，社会取向的四因素的再测信度（相关系数）则介于.43~.74 之间，皆达统计显著性。最后，再以验证性因素分析（CFA）检验个人取向与社会取向的四因素结构，发现模式契合度均相当好（GFI 均为.99，CFI 分为.96 和.98）。

（二）自我观量表的编制

在表 2 至表 5 中，我们已为个人取向自我观的四个因素选出了高因素负荷量的题目；在表 6 至表 9 中，我们也为社会取向自我观的四个因素选出了高因素负荷量的题目。我们遂利用这两套题目编制成两套标准化的量表，其分量表的名称与题数如下：

1.	“个人取向自我观量表”	41 题
	（1）独立（independence）	14 题
	（2）自主（self-determination）	10 题
	（3）竞争（competition）	10 题
	（4）一致（consistency）	7 题
2.	“社会取向自我观量表”	44 题
	（1）情境自我（contextual self）	11 题
	（2）人际连结（interpersonal relatedness）	12 题
	（3）自我修养（self-cultivation）	12 题
	（4）社会敏感（social sensitivity）	9 题

以上两套量表之总题数分别为 41 题和 44 题，各自测量四个因素，可谓相当经济，应可直接用于正式研究。这两套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相当好，个人取向自我观量表的四个分量表之初步 Cronbach α 系数介于.78 至.90，社会取向自我观量表的四个分量表之初步 Cronbach α 系数介于.71 至.86，加总四个分量表的总量表之初步 Cronbach α 系数更高达.90（个人取向）和.91（社会取向）。

本研究亦对两份自我观量表进行初步的辐合与区辨效度（convergent and divergent validity）检验。我们假设：个人取向自我观应与独立我的测量间存在正相关，而与互依我的测量没有相关；反之，社会取向自我观应与互依我的测量间存在正相关，而与独立我的测量没有相关。表 10 列出个人取向与社会取向自我观量表之各分量表与两份独立我/互依我量表间的相关，我们可发现：个人取向自我观的四个分量表得分与两份独立我量表的得分皆达显著正相关，社会取向自我观的四个分量表得分与两份互依我量表的得分皆达显著正相关，显示个人取向与社会取向自我观量表的辐合效度甚佳。另，个人取向自我观的四个分量表得分与两份互依我量表的得分间有少数显著相关，但以效果量（相关系数之绝对值）来看，个人取向自我观与互依我间的关联性远低于其与独立我间的关联性；同样的，社会取向自我观的四个分量表得分与两份独立我量表的得分间有少数显著相关，但以效果量来看，社会取向自我观与独立我间的关联性也远低于其与互依我间的关联性。可见，个人取向与社会取向自我观量表的区辨效度亦佳。

表 10 个人取向及社会取向自我观各分量表与两份独立我/互依我量表间的相关

自我观	(1) 独立我		(1) 互依我		(2) 独立我		(2) 互依我	
独立	.38	***	.08		.43	***	-.02	
自主	.44	***	-.08		.34	***	-.23	***
竞争	.28	***	-.15	***	.19	***	-.05	
一致	.25	***	.13	**	.29	***	-.05	
情境自我	.09	*	.27	***	.03		.20	***
人际连结	-.22	***	.32	***	-.09	*	.49	***
自我修养	-.17	***	.30	***	-.09	*	.28	***
社会敏感	-.13	**	.30	***	-.19	***	.33	***

* $p < .05$ ** $p < .01$ *** $p < .001$ 注：(1) ^[42]; (2) ^[41]

接着，我们再以阶层式多元回归分析来进一步检验两份自我观量表的构念效度。我们假设：若个人取向自我观主要与独立我有关，则排除独立我的影响之后，互依我对解释个人取向自我观的变异量应无增益效果 (incremental effect)；同样的道理，若社会取向自我观主要与互依我有关，则排除互依我的影响之后，独立我对解释社会取向自我观的变异量应无增益效果。

为求精简，控制统计检验的数量，以减低第一型误差 (Type I error) 的风险，我们遂以个人取向自我观量表的总分为依变项，在阶层式回归的第一层先放入 Gudykunst 等人^[42]之独立我量表的分数，发现其可解释 24% 的变异量 ($\beta = .45, p < .001$)。在回归的第二层，我们再放入互依我量表的分数，发现其能额外解释的变异量只有 4% ($\beta = .20, p < .001$)。最终的回归方程式达统计显著水平 ($F = 129.60, p < .001$)。由此可见，个人取向自我观确实主要与独立我有关，其与互依我的关联微乎其微。

同样的，我们以社会取向自我观量表的总分为依变项，在阶层式回归的第一层先放入 Gudykunst 等人^[42]之互依我量表的分数，发现其可解释 36% 的变异量 ($\beta = .60, p < .001$)。在回归的第二层，我们再放入独立我量表的分数，发现其能额外解释的变异量为 0 ($\beta = .03, ns.$)。最终的回归方程式达统计显著水平 ($F = 192.45, p < .001$)。由此可见，社会取向自我观确实主要与互依我有关，而与独立我几乎无关。

最后，我们藉以比较个人内之个人取向与社会取向自我观的相对强弱来再度检视这两份量表的构念效度。我们假设：现代华人虽已发展出个人取向与社会取向并存的双文化自我，但根源于中华文化传统的社会取向自我观应仍占据主导地位，亦即在个人内的比较上，社会取向自我观应强过个人取向自我观。我们分别在全体样本、女性样本、男性样本、学生样本及成人样本中以配对 t 检定比较个人取向与社会取向自我观量表总分的差异，结果相当一致地显示：无论在何种样本中，个人内的社会取向自我观均显著高于个人取向自我观的分数，详见表 11。

表 11 个人内之个人取向与社会取向自我观的相对强度比较

样本	个人取向自我观总量表平均数	社会取向自我观总量表平均数	Paired t	
全体	4.03	4.43	-21.71	***
女性	4.02	4.42	-18.32	***
男性	4.03	4.43	-11.87	***
学生	4.00	4.41	-20.57	***
成人	4.19	4.57	-6.32	***

*** $p < .001$

四、讨论与结论

(一) 本研究的成果与意义

1. 系统地探讨中西自我观的异同

人何以为人？自我的本质是什么？自我又如何体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这些看似深奥的哲学问题，实则是心理学家在开展自我相关的研究时必须认真思索和深入探究的核心议题。一方面，我们对“自我”本质的把握，可为自我的心理学研究提供哲学的根基和理论的基础。另一方面，我们所持有的“自我”观念，不管是清晰的还是模糊的，不管是理性意识到的还是内隐不显的，都是自我的心理历程开展的动力与依归。举凡自我概念（自我知识）、自我呈现（自我历程）、自我评价（自我维护）、自我接受（自尊）及自我实现，皆源自个人特有的自我观，也都成就了个人的自我观。更不用说，看似玄虚清谈的哲学命题，实则亦是每个人生命中无可回避的试炼和人生意义之所在。

自我观除了前述的哲学意涵，如对“自我”作为哲学性本体的反思与界定外，还离不开人我关系、人与社会及人与环境的关系，可谓同时彰显了人最根本的社会性与文化性，亦根植在每个人的社会参与及文化实践之中。这样的议题在心理学研究上的重要性自不待言，西方心理学者如 William James^[44]将自我的研究引入了西方主流心理学的领域，他的“主体我”（I-self）与“客体我”（Me-self）的划分，呼应了西方文化传统中一以贯之的主客对立式认识自己的特色，也有效地表达自我所独具的主宰（觉知之我，建构之我）与被动（被觉知之我，被建构之我）的双重性，成就了西方自我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典范。主体我与客体我的讨论其实是很有可能延伸到深层的自我观的探讨的，只可惜 James 及其后学并未在此议题上多做系统性的讨论。随着认知学派的兴起及主导，西方自我心理学者的主要研究兴趣遂转向了自我认知（self-cognition）和自我历程（self-process）的探讨，如自我概念、自我基模、自我维护、自我呈现等，对其背后深层的自我观议题始终视而不见，不论是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都付之阙如。

近年来，随着文化心理学的兴起，心理学家开始注意到在不同的文化脉络之下，人们对自我的观念及体验其实是十分迥异的。Markus 和 Kitayama^[5]的“独立我/互依我”建构无疑是文化与自我研究的一个里程碑，也吸引了无数学者的跟进。但是，正如前文所指出的：独立我与互依我的理论建构是聚焦在人我关系的界定与运作上的，作为一套理论构念，它的诱人之处在于将纷杂失焦的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建构定位到个人层次，锁定在人我关系的议题上，让“文化”的作用得以在心理学的分析中展现。不过，也正因如此，独立我与互依我的建构有其局限性，其所反映的文化与自我的互动关系缺乏了哲学省思的深度，如 Tu^[15]对“自我”作为主体的考察；也不及人类学家论述自我时的厚度，如许烺光^[10]所阐述的关系性、互动性的“人”（Jen）。类似“独立我/互依我”的建构，如 Sedikides 和 Brewer^[27]所提的“个体我/关系我/集体我”（individual self, relational self, collective self），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且这组“自我三元论”的建构更明确地关注自我知识（自我概念）和自我认同，而非自我观念。

就笔者所知，本研究是心理学者首次以概念分析的方法，全面地整理东、西方文化中社会取向与个人取向的自我观，再续以密切相应的实证研究——以因素分析法鉴定出两套自我观内涵的各四个主要因素，以心理计量的方法编制出两套标准化量表。如此跨越理论分析与实证衡鉴的努力是至关重要的。在理论层次上，它能帮助我们清楚地对显出东、西方文化中自我观的不同样貌，并可明确地界定出社会取向与个人取向自我观的主要内涵，在我们的概念架构中，两者都包含两大类，第二大类又可分为三小类。在实证研究上，我们以因素分析法鉴定出的自我观因素结构，一则可与理论层次的概念内涵呼应，亦提供了编制标准化量表的架构，所产出的两套量表遂具备了坚实的实证基础。

细究个人取向自我观之四个因素的意义，我们可发现：第一个因素中负荷量较高的题目（参见表 2）

所表述的内涵主要有二：其一是征服环境并实现自己的潜能（如第 1、2、3 题），其二是保有自信并坚持独立运作（如第 4、5、7 题）。西方文化中强调个人应主宰环境、驯服环境、超越环境的局限，所彰显的人性观正是视个体为世界之中心，在本质上与其它人及社会大环境是对立的、有区隔的、完全不同的实体，许烺光^[10]谓之“拖勒密式”（Ptolemaic）人性观，这也正是视自我为“独立”个体的本质。Oyserman 等人^[24]综合整理、分析了现有测量“个人主义”文化价值的诸多工具后指出：“重视个人的独立性”（valuing personal independence）是最有共识的个人主义文化内涵，具体而言就包含了自由、自足及掌控人生（freedom, self-sufficiency, and control over one's life），这与我们所发现的“独立”自我观相当呼应。

个人取向自我观的第二个因素“自主”中负荷量较高的题目（参见表 3）所表述的内涵相当明确：忠于自我，不受别人的影响（如第 1、5、7、题）。与前一“独立”因素不同的是，此处所关注的是，自己对自身的看法与认同不应迁就别人，特别是人生的重大决定应由自己作主，这也是杨氏在分析“个人取向自我”时所强调的自决（self-determination）的特征。在前述 Oyserman 等人^[24]的整理中也提到“个人目标”（goals）是另一个有共识的个人主义文化内涵，具体而言就是追求个人目标、愿望及成就（striving for one's own goals, desires, and achievements），这与“自主”的自我观亦可相互呼应。

个人取向自我观的第三个因素“竞争”中负荷量较高的题目（参见表 4）所表达的内涵就是：透过人际竞争和个人成就来肯定自我的价值。正如前所述，西方文化的人性观在本质上就将自我与其它人放在对立或拮抗的关系上，竞争与成就一直是西方文化中十分强调的价值，也是 Oyserman 等人^[24]所列出的“个人主义”文化内涵中的第三项要素，即“竞争”（compete），指的是力争上游，胜过别人（personal competition and winning）。

最后一项个人取向自我观的因素是“一致”，其中负荷量较高的题目（参见表 5）所表达的内涵很一致，就是不论在何时、何地、对何人，自我的表现都要一致。Markus 和 Kitayama^[5]在建构“独立我”时便强调，表现一致是西方文化对自我的要求之一。Suh^[33]也认为“一致性”（consistency）是西方心理学中对自我的一个最基本预设。至此，我们应可说，由因素分析所得的“独立”、“自主”、“竞争”和“一致”这四大因素确实能反映西方个人主义文化下自我观的重要特色，也与之之前诸多学者对个人主义、独立我、个人取向自我等概念主要内涵的分析相互呼应，可说具备了文化意义。

我们再细究社会取向自我观之四个因素的意义，可发现：第一个因素“情境自我”中负荷量较高的题目（参见表 6）所表达的主要内涵其实是“变”：人在不同的情境、场合、角色关系中都应该有所调整，以求表现最合宜的行为（如第 1、4、5 题）；同时接受“变”是一种常态，矛盾与冲突也是完全可能发生的状况（如第 2、3 题）。许烺光^[10]就指出“情境取向”是华人自我运作的一大特色。Suh^[33]的分析则指出集体主义文化下的亚洲人并不追求跨情境的一致性和稳定性，反而强调应视情境的要求而弹性地调整自我表现的内容与方式。Oyserman 等人^[24]在整理分析了既有的测量“集体主义”文化价值的工具后也指出：“脉络”（context）是集体主义文化的核心内涵之一，具体而言即为：自我随脉络或情境而改变（self changes according to context or situation）。或许情境自我得以产生的基础正是华人世界观中素朴辩证论的思考色彩，即相信整体比局部重要，同时又能容忍矛盾与不一致的存在^[34]。

第二项社会取向自我观因素“人际连结”中负荷量较高的题目（参见表 7）所表达的内涵主要是将自我与家庭视为一体，并将家庭福祉置于优先的地位，这里除了家人，其实也包括了个人认定的“亲近的人”。Oyserman 等人^[24]将“责任”（duty）和“连结”（related）列为集体主义文化价值的两项最重要核心内涵，前者是指作为团体一员所必须承担的责任和牺牲（duties and sacrifices being a group member entails），后者则指视亲密他人为自我的一部份（considering close others as integral part of the self），此两项所呼应的正是“人际连结”的自我观内涵。再者，无论是“互依我”还是“社会取向自我”均强调自我与他人之关联与

互依的特征，这当然也是华人自我之“关系中的人”的本质所在了^[10]。

第三项社会取向自我观因素是“自我修养”，其中负荷量较高的题目（参见表8）所表达的是对道德修养的关注，以及对“大我”的追求。正如杨中芳^[16,17]所言，儒家传统对自我修养是相当重视的，也视“克己复礼”的道德实践为华人追求至善“大我”的途径。陆洛和杨国枢^[35]在分析华人以“君子”为典范的自我实现时也强调道德修为与精神提升的重要性。有趣的是，Markus和Kitayama^[5]在建构“互依我”时并未指出这一自我构念的道德性内涵，而Oyserman等人^[24]在整理集体主义文化价值的内涵时也未提及道德或精神的意涵。或许正如Kim^[27]指出的：“集体主义”所指的其实是除了西方个人主义文化之外的所有文化，故这么笼统广泛的类别是无法突显华人儒家传统特色的，也因此，本土化的分析格外重要。

社会取向自我观的第四个因素“社会敏感”中负荷量较高的题目（参见表9）所表达的内涵主要是对他人评价的关注以及维护人际和谐的重要性。杨国枢^[6]在分析“社会取向”时就指出：泛指的他人的评价与观感对华人是至关重要的。杜维明^[15]也认为儒家传统下“他人的出现”对自我的修养有着关键的影响。另一方面，对他人保持高度敏感，才能维系人际和谐，而“和谐”（harmony）也是集体主义文化价值的核心内涵之一^[24]。至此，我们应可说，由因素分析得到的“情境自我”、“人际连结”、“自我修养”及“社会敏感”这四个因素确实能反映集体主义文化下自我观的重要内涵，也更突显出华人儒家传统强调道德修为的特色，也与之前诸多学者对集体主义、互依我、社会取向自我等概念主要内涵的分析大致都可相互呼应，可说具备了文化意义。

2. 两套自我观之间的关系—对立或融合

在现有的理论建构与实证研究中，“集体主义”及与集体主义文化有关的构念常被赋予负面的意涵^[45]，且许多西方学者相信随着社会进化与现代化的变迁，它们终将被“个人主义”及其相关的构念所取代^[1,30]。但是，这样的研究典范已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批判^[46]。事实上，已有证据显示所谓的“个人传统性”并不会完全蜕变成“个人现代性”。杨国枢^[18]在详尽回顾了华人在现代化冲击下，心理特征变迁的相关文献后就指出：中国人的社会取向确有减少，个人取向确有增加，但这绝不意味着中国人的社会取向会完全被个人取向所取代。黄光国^[47]在分析了儒家思想的内在结构后，进一步检视了台湾大学生所知觉的两代价值差异。结果也发现，某些重要的核心价值在两代间并未有太大的改变，但也有些传统价值正在淡化。作者进一步阐述，在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价值与现代价值是可以并存的，甚至可能融合成一套新的价值体系以为生活的导引。

Markus和Kitayama^[5]在发展“自我建构理论”时也曾假设“独立我”与“互依我”是两套可以并存于同一文化，同一个体的自我系统，只是强弱的差异与受重视的程度不同而已。最近的实证研究就显示：“独立我”与“互依我”在个体身上确实是并存不悖的。在跨文化的分析中，陆洛等人^[41,48]一再发现“独立我”与“互依我”这两套自我系统是可以共存的，且此“自我融合”现象在台湾华人中特别明显。故，整体而言，现代华人的“互依我”并不会先决地排斥“独立我”，而是两者共存共荣，唯两者对华人的人格及心理历程之重要性仍有不同。此发现印证了不同的文化传承在个体身上可能共存、折衷、融合，但“原生”文化依然占有优势的地位^[49]。

若我们能超越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建构的模糊性，也扩大独立我/互依我建构的狭隘性，直接检视涵括了本体与功能双面向的自我观念，结果又会如何呢？本研究的实证资料正可回答这样的问题。由于本研究的每位受访者都同时完成了两份量表，我们便可直接计算个人取向四因素与社会取向四因素间的Pearson相关。结果发现：在4×4的相关矩阵中，共有13对（81.25%）相关系数达统计显著水平（ $p < .01$ ，双尾检定）除一对之外，皆为中、低度正相关，效果量介于.01到.63之间，差异颇大。故我们续以典型相关（canonical correlation）进行分析，结果请见表12。由表中数据可知，个人取向与社会取向自我观之间共有三项具统

计显著性的典型相关，其中第一项典型相关系数最大（.76， $p < .001$ ）。此一典型相关可自个人取向自我观四因素之线性组合分数的总变异量中抽出 27%，可自社会取向自我观四因素之线性组合分数的总变异量中抽出 24%，远超过其它两项典型相关（至少对社会取向而言）。此一主要典型相关所显示的是：“情境自我”与“自我修养”两项社会取向自我观因素的线性组合分数与个人取向自我观的“独立”分数成统计上显著的正相关。

表 12 个人取向自我观四因素及社会取向自我观四因素间的典型相关分析

典型相关项目	一	二	三
特征值	1.376	.405	.302
百分比	66.038	19.425	14.470
典型相关系数	.761 ***	.537 ***	.481 ***
典型相关系数平方	.579	.288	.232
个人取向自我观因素	η_1	η_2	η_3
1. 独立	.990	.002	-.048
2. 自主	.179	-.234	-.443
3. 竞争	.101	.686	.298
4. 一致	.212	.410	-.872
抽出变异数百分比	26.693	17.341	26.207
重迭量	15.460	4.997	6.072
社会取向自我观因素	χ_1	χ_2	χ_3
1. 情境自我	.923	.040	.355
2. 人际连结	.390	.661	-.463
3. 自我修养	.737	.226	-.502
4. 社会敏感	.335	.858	.262
抽出变异数百分比	24.031	8.829	3.827
重迭量	41.491	30.637	16.516

*** $p < .001$

前文已详述，个人取向自我观中的“独立”意涵主要是超越环境的局限，并坚定自信心；而社会取向自我观中的“情境自我”之意涵主要为相信“变”是不变的原則，并依情境、角色、关系的要求调整自己，做出最合宜的表现；至于“自我修养”的内涵则更强调经由不懈的道德努力，力求超越“小我”，完成“大我”。表面看来，“独立”十足反映了西方文化强调以个人为中心去宰制环境的信念^[10]，以及对自信的高度重视^[33]，不过，这样的独立、主宰和努力，如果能置于“行仁”的道德规范之下，其实正是儒家所强调的“忠恕之道”。也就是经由主体自我的提振与觉醒，从修身的内省功夫开始，由“修己以敬”到“修己以

安人”，再到“修己以安百姓”，将道德实践的范围从自己开始，在人际关系网中层层外推，在这渐次提升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我”实践中，自我的主体性、独立性和主宰性是关键性的起点，自我的觉醒和自动自发的努力正是儒家所谓自我修养的精华^[35]；而儒家的典范“君子”是十足入世的，他们不是消极地适应环境，而是依照自己的道德理想戮力改造世界；他们投身俗世之中，追求道德、学问及美的卓越，以滋养身心，提升精神^[50]。这样的自我转化历程所反映的正是华人民间社会所流传的“成事在天，谋事在人”的积极进取精神，最近的实证研究也发现：在台湾华人中“互依我”与强调独立主宰的“初级控制”（primary control）信念并不冲突，反而能共同促进心理福祉^[41]。虽然典型相关分析的结果有时很难清楚地解释，较宜视为探索性的分析，而非验证性或假设检验性的分析^[51]，但我们可初步假设：现代华人在自我修养的道德前提之下，遵循社会角色和社会情境的规范做出合理合宜的表现，也努力超越环境的局限，展现积极进取的精神和坚定不移的自信，并非不可能、不可行、或不可欲，反而可能同时发扬了西方文化与儒家传统中的积极精神，也符合了重视成就和努力，同时强调道德与伦理的现代华人社会的要求^[18, 52, 53]。当然，这只是初步假设，有待更多、更严谨的实证资料来检验。

（二）未来研究方向

自我观是自我心理学研究亟需发展的处女之地，也与其它心理学研究议题，如认知、动机、情绪、生活适应密切相关，更有可能超越心理学科的范畴，与哲学、伦理学、人类学、社会学、文化研究、教育学等诸多学科对话，在理论上统整，在研究上合作，以期对人性的本质有更细腻的探究，也对人性之共性与殊性有更深刻的理解。碍于篇幅，以下仅就未来心理学取向的可能研究方向择几项概述，以期抛砖引玉。

首先，研究者可以新编之两套自我观量表为工具，以大样本调查法描述现代华人社会中不同自我观组型的分布情形，并进一步探讨在世代、性别、社经地位、城乡等人口学向度上，这些组型的分布是否不同，也初步探索不同组型的人在某些重要的心理与行为面向上（如情感、信念、行为）是否呈现不同的样貌。理论上可能的自我观组型有四种：（1）个人取向与社会取向自我观皆高；（2）两者皆低；（3）个人取向自我观高，社会取向低；（4）个人取向自我观低，社会取向高。

其次，研究者还可采用极端（典型）取样法，依前述的四种组型分类，取各组的极端（典型）个案，测量其压力因应风格、生活适应及身心福祉。依理论推测，个人取向与社会取向自我观皆强者，由于具备较多的心理资源，拥有较平衡统合的动机需求系统，在现代生活中应较能积极地因应压力，生活适应及身心福祉皆应较优。但事实是否如此，其它组型者的适应情形又如何，仍有待实证数据来回答。

最后，笔者认为，在个人层次上分析个人取向与社会取向自我观的内涵、变迁及其适应功能是十分重要且有趣的研究议题，对华人心理学家而言，了解现代华人如何处理与化解个人取向及社会取向自我观之间潜在的冲突，了解这两套自我观如何各自影响华人重要的心理与行为，了解这两套自我观之间的冲突与统合如何影响华人的生活适应与身心福祉，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及实用意义。这些问题的探讨将有助于我们开始了解身处社会变迁与文化交融的历史洪流中的现代华人如何协调、折冲、统合两套不同的自我系统，以求更平衡有效地适应生活环境，追求幸福人生。这样的学术研究绝对值得我们全心的投入和不懈的努力。

参考文献：

- [1] Hofstede, G. *Culture's Consequences: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rk-related Values*. Newbury Park, CA: Sage, 1980.
- [2] Kim, U.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Conceptual Clarification and Elaboration // U. Kim, H. C. Triandis, C. Kagitçibasi, S. C. Choi & G. Yoon, Eds.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Theory, Method, and Application*. London: Sage, 1994: 19-40.
- [3] Triandis, H. C.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5.
- [4] Yang, K. S. Beyond Maslow's Culture-bound, Linear Theory: A Preliminary Statement of the Double-Y Model of Basic

Human Needs // V. Murphy-Berman & J. Berman, Eds. *Nebraska Symposium on Motivation, Vol. 49: Cross-cultural Differences in Perspectives on the Self*. Lincoln, N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3: 175-255.

[5] Markus, H. R., & Kitayama, S. Culture and the Self: Implication for Cognition, Emotion, and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1991 (98): 224-253.

[6] 杨国枢. 华人自我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社会取向与个人取向的观点[J]. *本土心理学研究*, 2004 (22): 11-80.

[7] Yang, K. S. Chinese Social Orientation: An Integrative Analysis // T. Y. Lin, W. S. Tseng & E. K. Yeh, Eds. *Chinese Societies and Mental Health*.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19-39.

[8] Marsella, A. J., DeVos, G., & Hsu, F. L. K. *Culture and Self: Asian and Western Perspectives*. New York: Tavistock Publications, 1985.

[9] Shweder, R. A. *Thinking through Cultures: Expeditions in Cultural Psycholog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10] Hsu, F. L. K. The Self in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 A. J. Marsella, G. DeVos & F. L. K. Hsu, Eds. *Culture and Self: Asian and Western Perspectives*. New York: Tavistock Publications, 1985: 24-55.

[11] Sampson, E. E. The Challenge of Social Change for Psychology: Globalization and Psychology's Theory of the Person.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89 (44): 914-921.

[12] Markus, H. R., & Kitayama, S. The Cultural Psychology of Personality.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1998 (29): 63-87.

[13] Bakan, D. *The Duality of Human Existence*. Boston: Beacon Press, 1966.

[14] Geertz, C. On the Nature of Anthropological Understanding. *American Scientist*, 1975 (63): 47-53.

[15] Tu, W. M. Selfhood and Otherness in Confucian Thought // A. J. Marsella, G. DeVos, & F. L. K. Hsu, Eds. *Culture and Self: Asian and Western Perspectives*. New York: Tavistock, 1985.

[16] 杨中芳. 回顾港台“自我”研究：反省与展望[C]// 高尚仁, 杨中芳. 中国人, 中国心 - 社会与人格篇. 台北: 远流出版社, 1991a: 15-92.

[17] 杨中芳. 试论中国人的“自己”: 理论与研究方向[C]// 杨中芳, 高尚仁. 中国人. 中国心: 人格与社会篇. 台北: 远流出版社, 1991b: 93-146.

[18] Yang, K. S. Psychol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as a Result of Societal Modernization // M. H. Bond, Ed. *The Handbook of Chinese Psych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479-498.

[19] Lu, L. & Yang, K. S. The Emergence and Composition of the Traditional-modern Bicultural Self of People in Contemporary Taiwanese Societies.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06 (9): 167-175.

[20] 陆洛. 人我关系之界定——“折衷自我”的现身[J]. *本土心理学研究* (台北), 2003 (20): 139-207.

[21] 杨国枢, 陆洛. 社会取向自我实现者与个人取向自我实现的心理特征：概念分析与实证衡鉴[J]. *本土心理学研究*, 2005 (23): 71-143.

[22] Fiske, A. P. Using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to Compare Culture—A Critique of the Validity and Measurement of the Constructs: Comment on Oyserman et al. (2002). *Psychological Bulletin*, 2002 (128): 78-88.

[23] Miller, J. G. Bringing Culture to Basic Psychological Theory—Beyond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Comment on Oyserman et al. (2002). *Psychological Bulletin*, 2002 (128): 97-109.

[24] Oyserman, D., Coon, H. M., & Kemmelmeier, M. Rethinking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Evaluation of Theoretical Assumptions and Meta-analysi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2002 (128): 3-72.

[25] Kitayama, S. Culture and Basic Psychological Processes—Toward a System View of Culture: Comment on Oyserman et al. (2002). *Psychological Bulletin*, 2002 (128): 89-96.

[26] Weiten, W., & Lloyd, M. A. *Psychology Applied to Modern Life: Adjustment in the 21st Century*. 7th ed. Belmont, CA: Thomson, 2003: 500.

[27] Sedikides, C., & Brewer, M. B. *Individual Self, Relational Self, Collective Self*. Philadelphia, PA: Psychology Press, 2001.

[28] Triandis, H. C., & Gelfand, M. J. Converging Measurement of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8 (74): 118-128.
- [29] Triandis, H. C., Leung, K., Villareal, M. J., & Clack, F. L. Allocentric versus Idiocentric Tendencies: Convergent and Discriminant Validation.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1985 (19): 395-415.
- [30] Triandis, H. C. Cross-cultural Studies of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 J. Berman, Ed. *Nebraska Symposium on Motivation,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s*. Lincoln, N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0, 37: 41-133.
- [31] Rogers, C. R. *On Becoming a Person: A Therapist's View of Psychotherap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51.
- [32] Coan, R. W. *Artist, Sage or Saint: A Survey of Views on What is Variously Called Mental Health, Normality, Maturity, Self-actualization and Human Fulfillmen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7.
- [33] Suh, E. M. Self, the Hyphen between Cultur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 E. Diener & E. M. Suh, Eds. *Cultur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00: 63-86.
- [34] Nisbett, R. E., Peng, K. P., Choi, I., & Norenzayan, A. Culture and Systems of Thought: Holistic versus Analytic Cogni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2001 (108): 291-310.
- [35] 陆洛, 杨国枢. 社会取向与个人取向的自我实现：概念分析与实证初探[J]. *本土心理学研究*, 2005 (23): 3-69.
- [36] Ho, D. Y. F. Selfhood and Identity in Confucianism, Taoism, Buddhism, and Hinduism: Contrasts with the West.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 1995 (25): 115-134.
- [37] Maslow, A. H. *The Farther Reaches of Human Nature*. New York: Viking, 1971.
- [38] Hwang, K. K. Morality: East and West // N. J. Smelser & P. B. Baltes, Eds.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Oxford: Pergamon, 2001: 10039-10043.
- [39] 杨国枢. 中国人对现代化的反应：心理学的观点[C]// 乔健, 潘乃谷. 中国人的观念与行为.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5.
- [40] 陆洛. 个人取向与社会取向的自我观：概念、测量、及其适应功能 (2/4) [R]. 华人本土心理学研究追求卓越计划之研究报告, 计划编号: 93-2752-H-030-001-PAE, 2006.
- [41] Lu, L., & Gilmour, R. Culture, Self and Ways to Achieve SWB: A Cross-cultural Analysis. *Journal of Psychology in Chinese Societies*, 2004 (5): 51-79.
- [42] Gudykunst, W.B., Matsumoto, Y., Ting-Toomey, S., Nishida, T., Kim, K., & Heyman, S. *Measuring Self Construals across Cultur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Sydney, Australia, July, 1994.
- [43] 廖玲燕. 台湾本土社会赞许量表之编制及其心理历程分析[D]. 国立台湾大学心理学研究所硕士论文, 1999.
- [44] James, W. *Psychology: The Briefer Course*.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892.
- [45] Lawler, J. Collectivity and Individuality in Soviet Educational Theory.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Psychology*, 1980 (5): 163-174.
- [46] Bendix, R.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Reconsidered. *Comparative Study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967 (9): 292-346.
- [47] 黄光国. 儒家价值观的现代转化：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J]. *本土心理学研究 (台北)*, 1995 (3): 276-338.
- [48] Lu, L., Gilmour, R., Kao, S. F., Wong, T. H., Hu, C. H., Chern, J. G., Huang, S. W., & Shih, J. B. Two Ways to Achieve Happiness: When the East Meets the West.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01 (30): 1161-1174.
- [49] Lu, L., & Kao, S. F. Traditional and Modern Characteristics across the Generations: Similarities and Discrepancies.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02 (142): 45-59.
- [50] Tu, W. M. Embodying the Universe: A Note on Confucian Self-actualization // R. T. Ames, W. Dissanayake & T. P. Kasulis, Eds. *Self as Person in Asian Theory and Practice*.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4: 177-186.
- [51] Rosenthal, R., Blanck, P. D., & Vannicelli, M. Speaking to and About Patients: Predicting Therapists' Tone of Voice.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1984 (52): 679-686.
- [52] Brindley, T. A. Socio-psychological Value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I). *Asian Thought and Society*, 1989, XIV (41-42): 98-115.
- [53] Brindley, T. A. Socio-psychological Value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II). *Asian Thought and Society*, 1990, XIV (43): 1-16.

Individual- and Social-oriented Self Views: Conceptual Analysis and Empirical Assessment

LU Luo

Abstract: A cultural analysis of diverse 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self was attempted. Two comprehensive conceptual frameworks pertaining to the individual-oriented and social-oriented self views were produced and used as the basis for subsequent scale development. The item pools were then written and revised. Large scale data collection (N=839) from college students and community adults were conducted.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revealed that both the individual-oriented and social-oriented self views were composed of four meaningful psychological factors. Basing upon these results, the final scale construction was accomplished, producing a 41-item “Individual-oriented Self Views Scale” and a 44-item “Social-oriented Self Views Scale”. Lastly, the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these newly constructed self scales were examined, demonstrating good reliability, acceptable convergent and divergent validity.

Key words: individual-oriented self views; social-oriented self views; culture & self; conceptual analysis; empirical assessment

(责任编辑：张冬玲)